

再生能源的公民參與 扭轉階層的可能

李若慈



台西村村民許文通

「（魏明谷縣長）你不知道我們台西村的痛苦在哪裡，現在我們台西村幾乎每一戶都是一個老人家、兩個老人家，沒有半個年輕人，你看的出來，有沒有半個年輕人？沒半個！」

這是公視「空污週特別節目」《窒息的台灣》第一場拍攝現場，七十八歲的台西村村民許文通說出心中的想法。

不只他，許多村民也聚集在此，希望能在「彰化縣大家長」等人的面前，說出自己二十年來的無奈。早上九點的台西村，村民們多已結束農事，一如往常地在樹下乘涼泡茶；第一班員林客運已駛離，距離下一班仍有兩小時，一輛輛大卡車、巴士沿著小路駛進，停在顯榮宮

“ 因為工業，我們村子死了，但若能透過綠能讓村子重生，會相當具有社會價值，而這正是我們發展綠能最主要的原因。 ”

前，環保署詹順貴副署長、彰化縣魏明谷縣長等人接連從黑頭轎車下車，這次是魏縣長時隔一年半再次來訪。

位於濁水溪出海口，有一群人過著耕種、捕魚的傳統農漁村生活，然而，自從十幾年前距離他們村子不到十公里的南邊蓋了巨大石化工廠後，一切都變了。他們的西瓜出現「瘋種」情況，只開花不結果；出海口鰻苗數量銳減；堤岸邊漸漸看不見海鳥；村民們的身體就跟這樣的環境一樣，逐漸失去生命力。這裡是彰化縣大城鄉台西村，彰化縣的最西南角。距離六輕僅僅八公里。每當南風吹起，台西村成為首當其衝面對污染的地區。

再生能源也遭大企業寡占？

落腳於雲林麥寮的六輕，自1998年開始運作，至明年將滿二十年。隨著石化產業發展越盛，重視環保的聲音也越加高漲。近幾年「再生能源」更成為各國積極開發、推動的產業；台灣新政府上任後，也喊出「2025年再生能源使用比例達20%」的口號。彰化縣政府於去年底開始積極向各國招商，與丹能風力公司（Dong Energy）、加拿大NPI、新加坡玉山能源等公司簽訂合作備忘錄，總投資金額高達一兆以上，即使是個別投資額也至少上千億。

然而，當能源民營化，便有可能因為大企業的寡佔，產生壟斷問題，此基礎需求的價格也可能遭到掌控；此外，大規模的投資也會對生態造成衝擊，例如，彰化離岸風場的投資案，在對於海岸及生態都不甚熟悉的狀態下，急著在今年底通過環評，極有可能影響候鳥、蝙蝠、中華白海豚等生物的活動，甚至導致死亡，不禁讓人懷疑到底是「綠電」還是「紅電」？會不會成為下一個六輕？一個著重在發展和利益的建設，在忽視社會正義的情況下，被犧牲的永遠是階層較低「輸家」，獲利者則是離污染最遠的「贏家」。

再生能源的公民參與

面對再生能源的發展，或許會有更好的選擇。

彰化縣大城鄉台西村的西南端，地處「風頭水尾」，在這樣的自然條件下，西瓜隨便種、魚隨便捉都有，不過，現在當地的自然環境讓台西村極適合發展太陽能和風力發電。

去年，詹長權教授提出「推展綠能做社區再生」的構想，讓賣電產生的利潤回饋社區。村民許立儀也開始在村子策畫相關事宜，半年多前，哥哥許震唐辭掉在台北的電信業工作，回到故鄉台西村，投入公民電廠的籌畫，不只因為和過去工作的專業有關，「也因為要回來照顧家人」，讓他決定回鄉照顧整個村子。「台西村這四十多年來真的都沒有進步」六輕設廠後，台西村的人口結構不斷改變，許多老年人因為癌症死亡，多數年輕人已離開，現在常住

“空污都不想改了，總該給我們可以再生的機會，若連重生機會都不給我們，這政府對我們也不具任何意義。”



人口不過兩百多人，留下的，大多是走不了的人。原本已地處偏鄉的台西村，更因為六輕這幾年來的摧殘，使得發展越來越差，「村民說村子再過十幾年就會不見。因為工業，我們村子死了，但若能透過綠能讓村子重生，會相當具有社會價值，而這正是我們發展綠能最主要的原因。」許震唐深刻體認到台灣的城鄉差距以及發展不均，期望村子能透過自己的力量重生。

公民電廠不同於一般民營電廠，是由下而上的參與模式，且不以追求利潤最大化為目標；「公民參與」是其精神，公民參與的意義不只是為了達到政府訂出的數字，「公民參與在裡頭，大家對於能源是有想法的，可以一起分享共同經驗。」媽媽監督核電廠聯盟秘書長楊順美說，當越多人參與，就有越多人關心，才有利於能源轉型。此外，再生能源的特性可以打破傳統電力結構，人人都能成為小型發電廠，不再像傳統的石化廠、核電廠等，只能由大企業投資。人們有了一些決定的權利，不只奪回公民用電選擇權，也自己掌握發電權。

總該給我們可以再生的機會

今年十一月，許震唐剛向縣政府送出「台西村綠能社區促進會」的人民團體申請，許震唐的父親許奕結在這一兩個月募集村民連署，收集居民的意見，「政府規劃、執行政策一定要由下而上，不是上而下，先聽聽居民、聽聽農民的聲音，這樣才會健全，否則常常不是抗議就是不同意，所以成立促進會的目的就在這裡，我們收集並融合大家的意見再給政府。」許奕結說。村子也談好三塊建地作為太陽能板預先架設地，然而，因為城鄉分布不均，台西村的饋線本來就不足，這三塊地發的電只能賣給台電，而不能自發自用；此外，台西村的土地多為農地，受限於「農地農用」的規範，不能在上面架設太陽能板，「我也贊成農地農用，目前農地開發不夠嚴謹，變更地目就能做其他用途，怕農地因經濟用途而被炒作。」但台西村多為七、八十歲的老農，有些土地已沒有在耕種，如果不能轉為其他用途時，農地從拋荒狀態漸漸死亡，針對這個問題，許震唐有另外的想法：「根據現地實勘、農人年紀、是否可繼續耕作等，都必須經過審核再決定能不能做移轉，這是政府要做的。如何讓一塊土地重新利用，是再生能源很大的重點。」

在許震唐的出資規劃中，50%來自企業，25%來自社區和居民，另外25%則希望來自政府，許震唐期望能把政府的角色拉進到「推展綠能做社區再生」的構想中，「現在再生能源條例是政府要推的，如果政府再不支持台西村、再不好好面對社區能源問題的解決，或是去建立一個路徑，政府就真的失職了，政府對於再生能源責無旁貸，對社區型公民電廠必須參與，提供居民一個管道。空污都不想改了，總該給我們可以再生的機會，若連重生機會都不給我們，這政府對我們也不具任何意義。」許震唐一轉輕鬆的神色，嚴肅地談論著，「當然一定會有人說為什麼我們可以向政府拿25%（約750萬）？還有比台西村污染更嚴重的地方，高雄大林蒲怎麼辦？或是其他村子也都向政府要25%怎麼辦？政府並沒有那麼多錢。」

許震唐清楚知道會受到甚麼樣的質疑，但他說「我們自許成為全台第一個綠能示範點，『示範』的目的是找出問題，而非成為樣板，當政府連第一步都沒有做，不可能找到後續可能面臨的問題，應該從台西村的個案找到通案的可能。」許震唐更直接表示「為甚麼我一定要等政府介入？」除了希望政府能正視空污問題，把這筆錢當作「空污補償金」外，也想試試政府對於綠能發展的決心，「我就開一條路讓他們來做嘛！如果最後還是等不到，我就去找企業、去募資，要弄公民電廠其實不難，這樣反倒能狠狠地打政府一巴掌。」因為承載著自己對於村子的情感，所以更希望政府能正視並著手處理，不只為了過去這二十年來因空污而死亡的村民，更為台西村的下一代和未來。

與外界連結 讓社區再生

推動再生能源做社區再生的方式是讓產生的利潤回饋社區，收益用途主要做為社區醫療照護，以及老人家的生活照顧，台西村一直沒有衛生的關懷據點，過去雖有一間衛生室，但也已荒廢。「我們村子的長照、健康照護很薄弱缺乏，希望這個收益未來能投入社區健康照護。」村民許文通也說到「醫療最為重要，再來是吃飯，尤其是小孩不在家，老人不會煮飯的這種，可以送便當給他們。」除了老人照護，公民電廠其實也利於社區的長期發展，因為是個稍具技術性的工作，須要維護、保養、營運，也需要人才，讓回鄉的人來公民電廠工作，把人才、年輕人拉回來，許震唐本身就是一個案例。

許震唐還結合社區營造，推動社區文化再生，規劃了「台西村影像館」，未來的營運方向除了台西村的影像陳列，也開放讓影像創作者舉辦小型展覽，也有一部分牆壁做動態影像紀錄片的播放，「我知道這個地方人來的不多，所以為了讓這個地方跟外界產生溝通，必須做影像培力的工作，參與學校、社會，或政府的案子，透過這樣的方式把外面對文化、對影像有興趣，或是有心在這裡創作的人拉進來，形成類似小型藝術家駐村的計畫。」



“ 公民電廠最主要的意義，就是讓居民共同參與社區事務，進而對社區產生認同感，凝聚力就強，外界影響會因此降低。 ”

台西村位於濁水溪出海口的特殊地理位置，也成為很好的創作題材，同時也能作為濕地生態的教育；許接著說：「以台西村遭受工業污染作為警惕，這裡也能作為社會大眾對於社會環境的反思，存在社會教育、社會價值的建立與學習的過程。這是台西村影像館必須建立的責任！」

產生凝聚力 自成一種抵抗

許立儀曾說：「整個台西村村民幾乎得靠老人年金過日子，你要叫他們怎麼站出來？當地民眾很難形成一股力量自己站起來，這就是南風中最困難的一件事。」問到她最初投入綠能村籌畫的想法及願景，她說：「台西村綠能村的開始是因為要面對六輕的發展和減煤的期望。台塑和麥寮的地方政府如鄉公所、民意代表等，都有很多的利益結合，如電廠促協金，居民也有電費補助，台塑與雲林已經是難分難解之現狀！台西村雖清楚六輕對我們的影響，但台塑會因為我們有越多聲音，就會想更多方法利誘地方官員，為了不讓我們大城鄉淪為下一個如麥寮鄉的共生集團，只能創造一個更健康的利益到社區。」

許震唐也有類似的擔心，他說：「企業力量一定比我們大，我也沒把握哪天我們會不會也瓦解……麥寮現在每個月拿六百元，也許哪天給大城鄉一千二，從此大城也禁聲，一個聲音也沒有，我沒辦法想像……」不過，他馬上補充：「我們不希望走向麥寮這條路，我不希望我們台西村的尊嚴被買斷！公民電廠最主要的意義，就是讓居民共同參與社區事務，進而對社區產生認同感，凝聚力就強，外界影響會因此降低，即便用錢收買也自成某種程度的抵抗。」

國家的考驗 社會的指標

台西村作為綠能示範村的意義有二，一是針對國家，象徵政府對於再生能源發展的決心，為他們開一條嘗試的路，二是社會上的意義，一個地處偏鄉的台西村若能透過綠能重生，將會成為重要的指標。

「我們不是在對付大財團，而是太陽花學運所謂的『自己國家自己救』，我們的村莊也要自己救，因為台西村畢竟是個小村莊，小到有一天如果真的沉沒在台灣海峽，政府也沒有注意到。」許奕結的妻子蔡惠珍帶著無奈的神情說，「唯有靠我們自己來翻轉，剛好配合政府現在呼著口號的綠能政策，我們也希望能把綠能帶進台西村。這樣一改變其他的地方就會跟著改變！」提到綠能示範村的規劃，她的口氣稍轉振奮，除了希望翻轉自己的村子，也期待其他如台西村的偏鄉能夠藉著再生能源的發展，獲得更好的生活條件和環境。

公民電廠 權力與階層扭轉的可能

我們社會上所製造出的苦難，不平等地降落在不同人的頭上，被犧牲的往往是社會中弱勢的一群，也是社會階層較低的人們或是地域。如六輕設廠時選址造成的台西村、雲林麥寮等地的悲劇，或是未來大規模架設太陽光電板，最有可能被剝削的也會是底層的百姓。底層的我們只能永遠任人宰割、永遠成為社會為了開發而犧牲的次等公民嗎？

許立儀兩年半前接受公民行動影音紀錄資料庫訪問時說：「任何環境運動終將演變成嚴重的社會階級運動，但現實且殘酷的是，這些發生在邊緣的環境問題必須回到首都、請求中產階級共同發聲。回頭以反國光石化運動為例，乍看是人民成功抵擋開發，但就地方居民的組織培力層面上看，是完全失敗的，因在這場運動中，若是沒靠著外面的中產階級、醫生、學者關心，一起造成輿論壓力，運動是沒有辦法成功的。」或許公民電廠著重公民參與以及人人都能成為小型發電廠的精神，不只為台灣的能源轉型鋪路，也透過底層人民的力量，為「扭轉社會階層」奠定基礎，媽媽監督核電廠聯盟秘書長楊順美說：「能源轉型很重要的概念是從下而上的改變，過去電力是從政府或大的電廠提供一般人用電，能源轉型很珍貴的是有「公民參與」在裡面。我在自家發電，我們用自己的發電供應社區，就是『能源民主』、『能源自主』。」

當社會中所有人都能源自主，甚至達到電力皆自發自用的境界，就能將外部成本內部化，不須再依賴大型發電廠，達到真正的能源轉型；當所有人都握有能源的權力，是一種不必再聽命於國家機器或是大財團的象徵，更是扭轉的起點。

「今天我們這麼多村民和鄉親來到這裡，你們沒有買礦泉水，因為在我們台西村沒有地方買一罐礦泉水，好幾年前，我們台西村有八九間雜貨店，現在沒有一間，要買瓶礦泉水要跑到大城，悲不悲哀？確實彰化縣就是我們台西村的村民最悲哀，你是縣長你知道嗎？你離得太遠了你知道嗎？」許文通對著麥克風說了最後一句。

“ 當所有人都握有能源的權力，
是一種不必再聽命於國家機器或是大財團的象徵，
更是扭轉的起點。 ”

交易市場下「走歪」的再生能源



「再生能源」是近年許多國家極力想推動發展的趨勢，不只因為它對環境更有善，也因為它「參與門檻相對低」的特性，即使沒有高額資金、電機或工程相關背景，都有辦法透過在自家頂樓裝設太陽能板參與再生能源的發電。透過人人的參與，各個社區發展公民電廠，或許也能達成首爾市長朴元淳於2012年訂定的「減少一座核電廠」目標。除了公民參與外，用電大戶如工廠和企業的力量也很重要，以美國為首，發展出一套再生能源憑證制度（Renewable Energy Certificate，簡稱REC）。

企業的認證 再生能源憑證制度的建立

公民「螞蟻雄兵」的力量雖重要，也是能源轉型的重要基礎，不過，這些力量在短期內實在不足，更遑論要達到2025年再生能源使用比例達20%的目標，因此，發電業者以及用電大戶的工廠更是不能缺席。政府於2017年四月成立「國家再生能源憑證中心籌備處」，並建立再生能源憑證制度，作為能源轉型的配套措施。此憑證可成為發電業者再生能源發電的證明，每發一千度的綠電，經濟部標準檢驗局便會發給一張憑證，用戶或企業也可藉由購買附有再生能源憑證的綠電獲得認證。

再生能源憑證成為各企業在國際間競爭的有利身分證，在碳排放量的揭露，以及能源使用上，便被標榜是環保的企業，做為一個評比、競爭的成績，能將產品出口到環保法規更嚴格的國家。然而，此憑證並不一定要藉由實際發綠電或是真正購買綠電才能獲得，它成了一種可以買賣的商品，此交易將「綠」、「電」分開，企業可以單方面購買認證該企業減碳的憑證（也就是「綠」）。當憑證可以被交易，便能刺激發電市場，有人有需求，便會有另一群人去生產更多的綠電。

企業的贖罪券 再生能源憑證「可交易化」

憑證變得有價值，所以「有辦法取得憑證」會變成一種生意，「通常只要變成能夠用金錢來衡量價值的時候，就會有各式各樣的偏誤讓你做到這件事情。」媽媽監督核電廠聯盟祕書長楊順美說，「我們希望的不就是實際使用再生能源嗎？希望大用電戶擔負一部份的發電責任，怎會是讓他們買再生能源的憑證呢？」她露出狐疑的表情，同時也對這樣的制定感到無奈。她用贖罪券來比喻，便宜到大家都能買，根本就不會實際發綠電，或是真正買綠電，又如政府對於造成汙染的工廠做出輕微的處分，對大煙囪只抽一點稅，「買贖罪券雖然是一種方法，但應該讓他們痛到，因而改變製程不是更好嗎？」楊順美說。

再生能源憑證化之後，好像會發更多綠電，但卻因為其「可交易性」，使得大企業能夠缺席於能源轉型中；因為擁有較大的資本額，可以發展出更好或是更有效率的能源使用方式，若輕易地就能買到憑證，企業變得不需參與發展，甚至對於能源轉型可以置身事外。若真演變成如此，那業者和企業很可能就只會用過去的方法讓它變成一種賺錢的生意。

“也不是完全沒有邏輯，這就是一個市場邏輯，然而，正是因為如此，所以到最後就會走歪。”

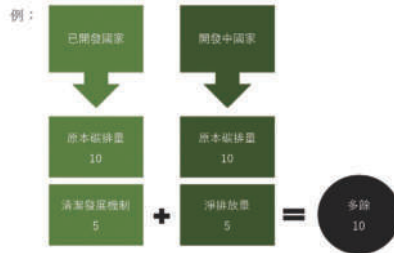
減碳機制 自由市場下的悲歌

減碳機制是《京都議定書》中的規範，分為四種：「共同減量」、「清潔發展機制」、「淨排放量」、「排放權交易」。

「共同執行」，實行於歐盟已開發國之間，透過幫忙另一個國家減量，甲國幫乙國，乙國再幫丙國……，每個國家都能獲得額外的碳權；「清潔發展機制」，由已開發國家對開發中國家提供技術及財務，協助其溫室氣體減量（不管成效如何，或者只是一種「宣稱」），已開發國家因此可以獲得一筆額外的碳排放量。「淨排放量」，例如，當一擁有森林資源的國家砍除樹木，另外種植棕櫚等經濟作物時，也能另外獲得一筆碳排放量。

「碳交易」則只是將這些已經超出額度的碳權進行交易的方式——資本家眼中獲利的「交易遊戲」：國家用「作弊」手段獲得更多碳權，並賣給其他國家。減碳機制成了充滿漏洞且保證可以賺錢的「生意」，最終可能導致碳排量不減反增，而結果便是加劇全球氣候轉為更惡劣。

這是因為此機制的建立，並非為了直接解決能源轉型的關鍵問題—減少石化燃料的開採，而是把現有的污染好好地檢視、計算後，使其變成新的交易商品。



市場邏輯下走歪的再生能源

再生能源參與門檻相對低的特性，讓人人都能參與發電，確實增加人民掌控能源、資源的權力，另一方面，也可能擴大財團的力量，例如：最近頻繁開環評會議的「彰化離岸風場」投資案，大規模建置風機對企業來說是筆大投資，但也將對生態帶來危害；「減碳機制」及「再生能源憑證」的交易制度也可能成為商人眼中的單純的投資，以獲取最大利益為目標。

為鼓勵各國共同減碳，因此建立減碳機制，排放權交易則允許簽約國彼此間互助，達成減排目標的國家可以將多餘的配額賣給未完成者；再生能源憑證制度的建立希望企業為了提升其競爭力而購買綠電，可交易化則期望透過自由市場的運作，刺激發電業者發更多綠電。「減碳機制」及「再生能源憑證」的制度都是為了改善全球氣候的目標而建立，不過，可交易化卻可能帶來反效果，當交易的制度不夠完善，便會成為資本家新的賺錢方式。「也不是完全沒有邏輯，這就是一個市場邏輯，然而，正是因為如此，所以到最後就會走歪。」楊順美說。

當憑證變得可交易化，是否真會成為企業的「贖罪券」？因為不用花更多錢去買真正的綠電，便能獲得「綠」認證，而非真正檢討其帶來的社會成本，並著手改善，實際參與能源轉型。我們都該以碳交易的例子作為警惕，對再生能源憑證可交易化抱持懷疑態度，監督及觀察是我們在此機制帶來無法挽救的結局前能做的。

採訪後記



再生能源 全新的領域

第一次自己去台西村的那天，正好碰上奕結阿公去開會，是一場在大城鄉公所有關「綠能村」的會議，但因為覺得這是一個從未碰過，又有難度的議題，應該很難在短時間內完成，而且有這麼多記者和紀錄片導演關注的台西村，應該早就有很多人在記錄這件事情了，便在一開始打消這個念頭，然而因為紀錄片完成日期的緊迫性，便跟老師提了記錄此議題的想法，並開始記錄這個「新事件」。一兩個月密集的為紀錄片做準備，最後卻因為時間不足而沒辦法趕上成發。

因為整個九月和十月都在為「空污偵查團」紀錄片培訓課程的事情掙扎，不斷請假去台西村、研究彰化魏明谷「風光大縣」的政策內容、上網看了不少關於再生能源的資料（也不小心看到慕情在「我們的島」的專題報導），比起對磚窯廠的了解，似乎做綠能村會更容易一些，此外也因為磚窯廠的採訪和資料查詢都還沒動工，更因為想要做「議題性」的報導，尤其台西村發展綠能是很新的事件，所以最後決定更換主題。

報導者的定位

十一月初換題目後，便馬上跟老師約了第二次見面，擬定好大綱，隔一週再次約了許震唐補訪；十月中因為紀錄片拍攝而採訪媽媽監督核電廠聯盟秘書長楊順美時，提到許震唐的公民電廠財務規劃，50%由企業投資或贊助（也還未確認）、25%由居民出資、另外25%則期望由政府出資，作為「空污補償金」。楊順美認為政府實在沒有必要出這筆錢，「對政府來說，出25%的基礎和理由是甚麼？許震唐希望把台西村作為其他能源村的『示範點』，那這樣其他村也會要求比照，政府沒辦法這樣做。」不過，許震唐針對這個質疑也提出似乎可行的說法，也因為楊順美和許震唐對於「示範點」的解釋不同，許震唐認為政府出資是為了從台西村的個案找到通案的可能，若一直不去做，永遠都找不到問題。雖然其中應該有更多我作為報導者該去驗證的部分，查證示範點確切的定義，也促成雙方不同想法的溝通，但礙於時間緊迫，我並沒有持續追蹤。

在整理完資料後，我決定換主軸，那時距離截稿日期剩下不到一週，發聲網工作人員蔡中岳跟我說：「基本上，妳應該是帶著題目去找受訪者，不太是每次受訪者說了什麼就改了題目方向。」自己確實從九月拍攝紀錄片開始，只要一遇到問題或是困難就換主題，然而這一次換方向的另一個原因，是我在消化完這些資料後，產生自己對於這件事情的觀點，即使並非那麼成熟，而一開始關於公民運動反思的想法則是中祥老師和中岳提出的建議（因為當時我實在沒有任何想法）。

為了追蹤這個議題，這三個月共去了台西村八次，光是九月份就去了五次。台西村之於我有種很特別的情感連結，雖然是因為報導才來到這個地方，但牽繫我跟台西村的並不是報導，而是對這個地方產生的情感，想讓更多人關注這個地方，但也因為自己把這種心態帶入報導寫作的過程，所以跳脫不出情感的限制，就如中岳說的，我一開始的想法便是希望為他們發聲，所以當要我帶點質疑去採訪許震唐時，對我來說是有點困難的。中祥老師則說：「你當然也能成為許家的發聲筒，但就要看你對自己身為報導者的定位是什麼。」

運行於社會潛規則中的媒體倫理

婉慈姊是我在第一次自己去台西村時認識的，負責台西綠能村的案子，所以過程中我也向她請教不少問題；前幾天為了做台西村公民電廠的時序表，所以也問她有哪些相關的事件，以及時間點，在知道我這次向她詢問問題是用在文字報導中時，她說：「台西村還希望縣府可以有些角色進來，他們還在推動，公開寫會壞了整個佈局。因為縣府這一端是政治，不是倡議。你先寫出來了，縣府看了不開心，最後台西村可能完全沒有辦法讓縣府拿出資源來協助，這對台西村也不是好處，更不用說，他們很多行政程序都需要靠縣府幫忙。」

推動中的東西本來就有很多不確定性，你現在寫下來了，可能明天就變了，雖然很多東西都公開好，但對某些政治人物來說不是這樣，所以才說這是一個政治問題，如果還想請他們協助提出資源，就需要保持關係。之前因為你是要拍片，所以可能需要這些細節脈絡，去決定怎麼呈現，或怎麼安排紀錄片的剪接跟內容，但是寫出來就是另一回事。

知道這些事情是讓你清楚如何旁敲側擊去倡議，或是讓縣府表態，不是變成公開的訊息，



這樣壞了關係，很多事情就會成不了。當事人講可以強化他們的立場與要求縣府，但是旁觀者或是媒體角色進場，就又是另外一回事了。如果你想要做紀錄片類型的，或是倡議關注議題的記者，其實需要有這些敏感度，或至少要尊重當事人，這些東西要不要寫需要交由他們來決定。」

「雖然還不是很懂，不過我會記著的！希望有一天能夠完全領悟哈哈，謝謝婉慈姊～～」我說。

以自己的方式為能源轉型努力

11/25，採訪完許震唐的隔天又去了趟台西村，應該是今年最後一次去了。除了拍攝台西村影像館外，也想走到溪邊看看。上次去已經是至少一個月以上的事情了，此次到訪，已經是冬天，尤其海邊的風更是大。沿著堤防邊的小徑走到溪邊，第一次距離六輕這麼近；濁水溪在冬天呈乾涸狀態，北風吹起河床的沙塵，隱約遮住煙囪和風機，呈現出一種末世感，是親身到訪後才感受到的震驚。不到半小時的路程，將台西村劃分成兩個世界。搭公車離開台西往彰化市區，兩個半小時，又是另一個世界了。

其實很擔心每次去拍的照片，都會成為此地最後一次被記錄，也許公民電廠真的能夠讓地方重生，使青年回流。不希望看到村民所說的「滅村」景象，我也實在無法想像……。

因為空污偵查團的紀錄片開始，接續青少年發聲獎的文字報導，希望接下來的十年、二十年，我都能持續關注台西村的綠能發展，以及這整個社會的能源轉型議題。也許不能直接參與，但是我用自己的方式，以「說故事的人」的角色，連結社會大眾和能源的關係，推動社會的能源轉型。